

doi:10.13582/j.cnki.1672-7835.2015.01.010

张君劢“修正的民主政治”^①

伍本霞

(湘潭大学 哲学系,湖南 湘潭 411105)

摘要:作为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的张君劢,最具特色的思想成果是他所谓的“修正的民主政治”。张氏这一思想成果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虽然具有即时性的历史合理性,但在学理上却存在诸多缺失。尤其在自由与权力、政治与经济和政治与文化之关系问题上,由于其文化保守主义倾向,许多提法和致思的理路都有问题。

关键词:张君劢;修正的民主政治;研究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7835(2015)01-0051-04

Zhang Junmai's "Modified Democracy"

WU Ben-xia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China)

Abstract: As one of the representatives of modern new Confucianism, Zhang Junmai's most featured thought is his "modified democracy".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Zhang Junmai's thought is proper in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background, but there are many deficiencies in his academic principle, especially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reedom and power, politics and economy, and politics and culture. Because of his cultural conservatism, many expressions and the train of thought are worth discussing.

Key words: Zhang Junmai; modified democracy; research

在现代新儒家中,张君劢同政治的关系最为密切。而在他的政治思想方面,又尤以其自谓的“修正的民主政治”最具特色。此种“民主政治”,意在“超越独裁政治与议会政治”。在他看来,以德国和意大利为代表的“独裁政治”虽可政令畅通,一呼百应,但却是对自由人权的限制,而以英国和美国为代表的“议会政治”,虽有自由和民主,但却同样不适于中国。而且,西方民主政治建立在经济放任主义的基础上,说到底是一种富人的政治。即是说,在张君劢的认识中,独裁政治与议会政治,各有利弊,得失参半,而中国未来政治形态的选择,不可照搬这两种模式,而是要有自己的“主见”,自主地确立“适于中国国情的政治方式”。

表面看来,张君劢的大体思路似乎可取。但是,张君劢无论在对他的“修正的民主政治”之理论阐释方面,还是在对所谓的“国情”之理解上,都是值得商榷的。至少在关乎自由与权力,政治与经济和政治与文化等关系方面,他的诸多看法都是有问题的。

1 自由与权力之间

张君劢的“修正的民主政治”,用他自己的话说,乃是一种“调和”和“折中”的政治形态,即在自由与权力之间,“求得一中道”^{[1]509}。

① 收稿日期:2014-04-03

作者简介:伍本霞(1986-),女,湖南常德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哲学研究。

为了求得这一“中道”,张君劢首先给自由和权力划出了他所理解的范围。在他看来,自由是对个体而言的,而权力则主要是对政府而言的。前者重在个人的自由发展以及生命财产等权利的保护,后者则重在政府的行政效率。他认为,为了使“个人享有自由”,必先做到如下三点:(1)用宪法的形式保障人们“思想言论出版信仰种种自由”;(2)建立健全的选举制度;(3)国家权力机构采取“三权分立之制”,设立“独立的法官”,用司法独立的形式保障民众各种自由权利。至于权力方面,张君劢为了提高国家地位和政府行政效率,提出了一个包含十一条款的政体组成方案。这一方案的要点主要在如下方面:(1)各个党派需“牺牲党见”,并由各党派领袖组成“举国一致之政府”;(2)强化政府的行政权力;(3)建立一套超越党派之外的文官制度,避免各党派对行政的干预;(4)加强专家在政府决策中的作用,使行政“趋于专家化或科学化”,从而避免以往“政客操纵”之弊。

从上述内容看,似乎张君劢在自由与权力之关系上确实找到了一条“中道”,而且他自己亦说过:“一个国家对于自由与权力,仿佛人之两足,车之两轮,缺一即不能运用自如。”^{[2]147}但实际上,他在自由与权力之间,非但没能做到“调和”与“折中”,而且明显地倾向于权力一端。在他看来,国家相对于个人具有优先性,不是国家服从个人,而是个人服从国家,即所谓“不应以个人驾国家而上之”。看重自由的张君劢之所以将权力置于自由之上,原因既在时势,又在他对自由与权力之关系的理解方面,存在学理上的误解。就后者而言,主要体现在如下几端:(1)他虽然重视自由,但却又十分担心人们对自由权行使过度而给社会带来灾害。(2)在张君劢的思想里,自由和权力在哲学的意义上是有本质区别的;自由只是一变量,可因时势的变动而变动,而代表权力的国家则是恒量,具有公共性、普适性和永久性,因而是“目的而非工具”^{[3]229}。(3)张君劢将自由作工具性看待和担心人们对自由权的滥用,原因还在于他深受德国哲学的影响,其对国家、社会与个人之关系的认识,很大程度上可视为黑格尔哲学的中国版本。从其主观意愿上看,张君劢为中国设计的政治蓝图,底本是英美式的民主政治,然而他的政治哲学的根底却不在英美的经验主义哲学,而在德国和法国,尤以黑格尔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哲学。所以他将国家看作“自性”的“本体”,看作“普遍意志和全体意志的合一体”,并将基于民主和自由的议会政治看作同国家相分立的工具性设置。正惟如此,他所拟设的十一条方案,重点乃是对“议会政治流弊之矫正”,从而彰显“独裁政治之长处”^{[2]150}。

张君劢关于自由与权力之关系的论述,其实并非他的创见。在近代西方的政治思想史上,有关自由与权力之关系问题一直是思想家们所关注的重点,且由之而形成了以英国和德国思想界为代表的两种不同的社会思潮。从历史语境看,这两种思潮都有其合理性。但是,历史的合理性毕竟是历史性的,并非等同于理论的合理性。亦就是说,无论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哲学,还是张君劢“修正的民主政治”,在自由与权力之关系问题上,理论上都存在倒果为因的误解。自由与权力,自由是第一位的,是目的性的,人类一切政治的和文化的创获,都是以自由为目的的。自由既是初因,亦为终极性的理想。而权力只是因着自由这一终极性的理想而具有其自身价值的。除却自由,权力是无甚意义的。或者说,不以自由为目的的权力,必是异化甚或腐败的权力,是少数人为着私利而压迫众人的暴力工具。正惟如此,马克思才认为,当“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时,国家也就消亡了^{[4]273}。

2 政治与经济之间

张君劢“修正的民主政治”,并非仅就政治而言的,而是他的“立国之道”的纲领性主张,内中同时含有经济与文化层面上的指导思想。如在经济上,他认为在“修正的民主政治”中,只有“计划经济”才是可行的。在他看来,民主政治的建立,必需两个先决性的条件:一是个人自由,二是社会公道。二者缺一不可。一国之中,人民千千万万。各人的才智、思想、职业和境遇大不相同,政府无法用一种统一的方式使其平均发展,而只能听任他们在其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自由发展,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倘若政府干预,则是对个人才能的扼杀。所以,民主政治的第一个条件是“发展个人自由”。然而尽管各人的出身、境遇和职业不同,但其生活水平、受教育的机会、就业机会和参与政治事物的机会,应求得相对的平等。因而,民主政治的第二个条件是“社会公道”。而“社会公道”之实现,主要在经济领域,而途径便是“国家

社会主义下之计划经济”。而且在张君勱看来,为了在权力与自由之间求得一条“中道”,就必须介入“社会公道”这一重要环节。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一国之中最不可少者有二:甲曰政府之权力;乙曰国民之自由发展。介于此二者之间尚有社会公道问题,其所关涉的以经济为多。”^{[5]263}

张君勱倡行“计划经济”,还有一个目的便是尽快地发展民族经济,免受外国资本主义在经济上的压迫之苦。他称之为“民族自活”。按他的理解,中国的经济建设无非两大目标:一曰“民族自活”,二曰“社会公道”。所谓“民族自活”,即人们常说的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只有经济上做到“民族自活”,中国才可能得以强大。为此,张君勱为“民族自活”制定了一个十至十五年之内的目标:一,食品自给,米面鱼介之类完全禁止入口;二,棉纺毛织品自给;三,在钢铁、电气和化工诸领域建立起自己的民族工业。

张君勱认为,中国的经济建设,要想把“民族自活”和“社会公道”两大目标都考虑进去,世界上是没有先例可循的,惟有自己开辟一条新路。在当时世界,主要为两大经济形态,一是西方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二是苏联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而这二者,都是张君勱所不能完全接受的。因为在他的认识中,西方资本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各有长处,亦各有短处。西方资本主义的长处是:“政府不加干涉,听人民自由处理。人民自负责任,因而私人自动力发展。人们自负盈亏之责,故经营事业的方法,合于经济原则”。而短处在于:“财富集中于少数人,酿成贫富的不均。无统筹全局的计划,流于生产过剩。私人互相竞争,因竞争而生浪费。”^{[5]274}而苏联恰好相反,长处是“财富集中于国家,可以矫正贫富的不均”。短处则在于“国家权力过大,是以妨害人民自由”。然而,这两种经济形态,在张君勱的评价中,又绝不是半斤八两平分秋色的关系。他的评价更倾向于后者。他曾明确指出:“俄立于计划经济之下,故能通盘筹划……自比英美两国一任私人各自为政为有效。”^{[5]276}也正是在比较上述两种经济形态且在比较中有所侧重的基础上,张君勱系统地提出了自己所构想的有关中国经济建设的四点原则:“(1)为谋求个人生存之安全,并改进其智能与境况计,确立私有财产。(2)为社会谋公共幸福并发展民族经济与调剂私人经济计,确立公有财产。(3)不论公有与私有,全国经济须在国家制定之统一计划下,由国家与私人分别担任而贯彻之。(4)依国家计划,使私有财产渐趋于平均与普遍,使得人人有产,而无贫富悬殊之象。”^{[5]272}

如果从历史的合理性与道德的合理性两个维度看,张君勱为求“民族自活”和“社会公道”的经济思想,都是值得肯定的。要抵御外国的经济侵略,必须发展起自己的民族工业;要想消除贫富悬殊财富不均的社会现象,亦需国家的权力干预。但是,一个国家推行何种经济政策,采取何种经济形态,恐怕又不能取决于短时期的经济境况和抑强扶弱的道德情感。更重要的还在于,政治与经济密不可分。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对应的是它的自由民主政治,苏联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对应的是其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形态,二者绝非一种可以任意搭配的关系。而张君勱“修正的民主政治”及其“国家社会主义”的经济主张,恰好是想将资本主义的政治形态与社会主义的经济形态捏合在一块,并且想当然地认为,只有这样做,才可避免资本主义经济的放任之害,又可避免苏俄式的社会主义因经济权力过于集中而对自由人权的伤害。然而张君勱没有想到,他的经济主张,或许可以在短期内解决“民族自活”的问题,但却不能解决“社会公道”问题,更无助于其“修正的民主政治”的落实。道理是:

(1)一旦世界历史由农业时代转为工业时代,市场经济乃是一种合规律性的存在。市场的运行同国家权力是互为消长的两极,市场的弱化必然导致国家权力的强化。而一旦国家权力以一种超经济的姿态而控制全民的经济生活,其结果也就只能是对民主政治某种程度的否定。

(2)在张君勱的“国家社会主义”蓝图里,社会财富既有公有,亦有私有,“凡私人自谋而无害于国家之公利者,一任私人办理;其有害于国家公利者,由国家办理之”^{[5]280}。这样公私并存的混合型经济,表面看来似乎很合理。但问题的实质是,这二者又如何可能并行而不悖呢?一国之内,两种所有制并存,既有主次之分,亦有强弱之别。相对于私有制,公有制必然处于强势地位。因而进一步的问题是,私有制可能被公有制挤压得无以生存。

(3)张君勱认为“计划经济”之可行,关键在于经济领域有专家把关,实行专业化和科学化的管理。然而这同样是一种主观性的臆想,因为与计划性的经济并行而不悖的是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而在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环境里,专家的产生及其对经济事务的决策,都不可能不受政治权力的干扰。

3 政治与文化之间

张君勱所提出的十一条政体组成方案,第一条便强调,统一的政府“应以举国一致之精神组织之”。虽然在这十一条里,他没有对“举国一致之精神”作出具体内容的说明,但联系该时期张君勱的相关论述,不难发现,他所说的“举国一致之精神”,含义大致有三:一是传统儒家的道德学说;二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三是蒋介石的国家主义思想。虽然在他的“修正的民主政治”之阐释中,其“举国一致之精神”似乎只限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即“中山先生贡献于民国者尤大,其所确定之民族、民权、民生三大原则,实为今后不易之方针。”^[1]⁴⁷²然而在说了此番话语之后,张君勱笔锋一转,认为孙中山已逝世十几年,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此等事实自然影响到吾国之政治思想与立国方针。”^[1]⁴⁷²很显然,张君勱认为在新的形势下,“吾国之政治思想与立国方针”是应该有所改变的,不能再拘守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改变为何?尽管他没有明说,但从他的所谓“国家道德”的相关表述看,指的是蒋介石在20世纪30年代提倡的“新生活运动”中所鼓吹的“力行哲学”和所谓的“心理建设”与“伦理建设”的有关思想。正惟如此,此时的张君勱一改先前反对蒋介石一党独裁的政治主张,而是认为,一国之内,最高统治当局应该具备“道德的完全人格”,“来做国民的表率”,“一个个政治家的善良操守,构成其集体的道德——或曰国家道德”^[1]⁴⁸⁹。也就是说,这种以最高当局或最高统治者作为表率的“国家道德”即为“举国一致之精神”,亦为蒋介石所提倡的与“一个党”和“一个领袖”而并称的“一种主义”。

提倡宪政主张自由的张君勱为何在民族危难的时候会有如此明显的思想转变?原因诚然有民族主义的因素,但是问题的症结恐怕不在这里。因为,如果仅从民族主义之向度来思考,我们就无以回答下面两个问题:(1)为何走议会道路的西方各国能够成功抵御外族入侵?(2)苏联为社会主义国家,信仰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仅可以成功地保家卫国,而且为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其实,张君勱骨子里所信奉的并非西方的自由人权,而是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说^[6]。或者说,在他的精神取向和价值世界里,占主导地位的始终是儒家学说,而不是他从西方较为系统地学过来的资产阶级的自由人权理论。也正因为这样,他将文化保守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集于一身,并且试图借助儒家的“内圣”之学而开出现代民主政治的“新外王”。殊不知,儒家的“内圣”与“外王”为皮与毛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反过来理解也一样,毛之已废,皮将焉存!而此种关系,作为现代新儒家之代表人物的张君勱是不可能清楚的认识的。至少在如下两个关乎政治与文化之关系问题上,他或是没有思考过,或是思考有误:

(1)自从有了国家之后,政治同文化就是密不可分的。尽管很难说清楚,究竟是文化决定政治,还是政治决定文化,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什么样的文化就会有怎样的政治。

(2)儒家同两千多年来中国专制统治之关系,从19世纪末开始,一直是中国学界争论最为激烈的话题。然而,各执一端的西化派与以新儒家为代表的保守派,都没看到问题的实质。诚然,儒学对于专制统治,一直是持批判态度的。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儒学的限制,中国历代帝王的恶政和暴政,很可能更是肆无忌惮。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问题的另一面是,具有批判性的儒学却又是专制统治得以存在和延续的理论根据,而且它的批判性学说,由于其内在学理的悖论,逻辑地转换为专制统治的思想工具。此种关系,一直不被学界所认识。张君勱同样如此。他终生为儒学辩护,为民主宪政实现于中国而努力,却不知这二者如同水火,根本不可能合在一起。

参考文献:

- [1] 吕希晨,陈莹.张君勱新儒学论著辑要[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
- [2] 陈先初.精神自由与民族复兴:张君勱思想综论[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9.
- [3] 张君勱.民族复兴之学术基础(上卷)[M].北京:《再生》杂志社,1935.
-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 [5] 黄克剑,吴小龙.张君勱集[M].北京:群言出版社,1993.
- [6] 许苏民.从儒家政治哲学中发现“共和政体因素”[J].河北学刊,2013(3):22-28.

(责任校对 游星雅)